

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

ZHONGGUO FOJIAO SIXIANG SHIGAO

中国佛教思想史稿

第一卷 汉魏两晋南北朝卷（上）

潘桂明 著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

ZHONGGUO FOJIAO SIXIANG SHIGAO

中国佛教思想史稿

第一卷 汉魏两晋南北朝卷（下）

潘桂明 著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ZHONGGUO FOJIAO SIXIANG
SHIGAO

中国佛教思想史稿（第一卷·上）

本书是对中国佛教思想所做的综合考察和全面论述，内容自佛教传入至近代，时间跨度约两千年之久，涵盖佛教思想史上的主要人物、学派和宗派，及其相关的重要哲学范畴和命题；阐述并分析这些范畴、命题的演变过程，揭示在这个过程中体现的文化内涵、思维特征和知识取向。

全书由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近代三卷组成。第一卷详细考察和分析了中观学派的中道实相原理及其思维方式向涅槃佛性系统的心性学说转化的内在依据、文化背景，描述了这种转化的具体历史过程及其表现形态；第二卷对隋唐五代佛教宗派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变化予以重点分析和阐释，指出各宗派之间的思想联系以及矛盾差别；第三卷着重研究和阐明衰退时期中国佛教思想的基本形态，辨析产生这些形态的文化前提，推及传统佛教思想向近代过渡和转化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基于对佛教思想与儒、道两家学说关系的周密论证，既为学术界提供佛教思想研究的必备知识，又为深化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提供新视角、新思路。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佛教思想研究”的最终成果，结项鉴定为优秀等级，鉴定专家组认为，此书“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佛教思想通史著作，填补了学术界的一项研究空白”，“不仅是佛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成果，也为纠正学术界的浮躁风气，提供了学术典范”。作为个人的学术研究成果，该著凝结了作者孜孜不倦的求真精神，使之具有立论的全面性、系统性以及独创性等鲜明特点。资料广博而详实，内容周全而厚重，述论严密而深刻，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

上架建议：宗教研究

ISBN 978-7-214-06060-0



9 787214 060600 >

定价:235.00元(全三卷)

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

ZHONGGUO FOJIAO SIXIANG SHIGAO

中国佛教思想史稿

第一卷 汉魏两晋南北朝卷（上）

潘桂明 著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

ZHONGGUO FOJIAO SIXIANG SHIGAO

中国佛教思想史稿

第一卷 汉魏两晋南北朝卷（下）

潘桂明 著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作者的话

《中国佛教思想史稿》(以下略称《史稿》)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佛教思想研究”(01BZJ003)的最终成果。

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变化予以整体性描述,发端于十年前我的学术构思,那时我刚完成“中国居士佛教史”的研究,感觉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澄清,许多想法尚未系统表达,对相关事实则缺乏深度的理论分析,故有必要从思想史角度作进一步研究。

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佛教史,近百年来获得长足的进步,已经出版了多种学术著作;对部分佛教学者及其思想的研究,也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但是,对两千多年的佛教思想发展变化进行综合考察和论述,分析整理佛教思想演变的全部过程,揭示这个过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思维特点、精神实质,撰著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佛教思想史》,至今仍然没有真正得以实现。多年来,我在从事古代哲学史、佛教思想史、道教思想史的教学,获悉来自学术界各个领域的信息,觉得有必要通过自己的独立研究,为人们提供一部完整的佛教思想史著作,于是便有了《史稿》的构思及其撰述。

《史稿》的撰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期待:一是对中国佛教思想

发展演变的过程作全面追踪和具体描述,指出在这个漫长过程中佛教思想展开的基本线索,解答佛教“中国化”中出现的各种疑难问题;二是通过对佛教诸多概念、范畴和命题的揭示、辨析,指出它们如何对儒、道两家思想产生深远影响,为学术界提供佛教思想方面的各类研究资料,并为深化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贡献个人的见解和思路。

《史稿》根据佛教思想的发展变化特点,分三卷予以具体阐述。

第一卷阐述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的形成和演变。在该卷中,我重点处理和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以慧远与鸠摩罗什《大乘大义章》中的思想交流为范例,分析两人佛学分歧的核心观点及其原因所在,由此推及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和复杂性,以及这种交流的深层次意义;六家七宗般若学的玄学化思维如何转向中观学派的遮诠式中道思维,这种遮诠式思维又如何被逐渐消解,并为涅槃学表诠式思维所取代;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大乘起信论》的“一心二门”原理及其“本觉”学说如何发生作用(涉及对《起信论》思维模式的考察,以及产生这种思维模式的文化背景的反思);在对僧肇、道生等学者的佛教思想展开分析研究的同时,对学术界较少关注的僧叡、萧衍等人的佛教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中国哲学史、心性学说史上的地位作出个性化评估;通过对六朝时期名士与名僧学术交往的考察,揭示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总体精神面貌和知识取向,分析其中蕴含的文化背景和思想基础;以《世说新语》、《弘明集》、《出三藏记集》等为代表的六朝学术著作如何展示该时代思想界的整体精神面貌,思想家们如何以相对开放的心态善待各种不同学术观点以及由这些观点所体现的思维习惯;疑伪经典在南北朝时期不断出现,末法思想也已经开始形成,这些都与佛教思想的逻辑发展密切相关,所以有必要从社会政治、民族文化等角度作出合理解释;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形神之辩和夷夏之辨,它们所反映的思想文化现象,已非单纯的佛、道或儒、释之间的矛盾问题,而具有实质性意义和历史性影响。该卷以大量篇幅详细考察和分析了由中观学派的中道实相原理及其思维方式向涅槃佛性

系统的心性学说转化的内在依据、文化背景,描述了这种转化的具体历史过程及其表现形态。

第二卷阐述隋唐五代时期佛教思想的发展和变化。该卷重心是对隋唐佛教宗派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变化予以分析和阐释,指出各佛教宗派之间的思想联系以及矛盾差别。六朝佛教思想的开放性建设,以及士族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为隋唐佛教思想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佛教思想的繁荣又为儒、道两家思想的改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该卷重点处理和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在经历了唐初两次佛道论争之后,佛教如何确立在理论思维和哲学思辨方面的突出优势地位,为唐代佛教宗派理论体系的建立作出有效铺垫;通过对天台佛学基本概念、范畴和哲学命题的诠释,考察这些范畴和命题所表达的思维方式与《大乘起信论》思维模式的同异,以及天台心性学说(包括智顗“性具实相”、“无明即法性”,湛然“无情有性”等)对道教学者、儒家学者的深刻影响;考察吉藏三论学说的思维特色和核心精神,指出三论之学如何试图复原龙树中观学派理论,分析这种复原的尝试最终归于无效的理由;对玄奘唯识学的研究,除了厘清唯识学的基本概念、范畴,说明它的基本精神和特质之外,更有必要指出玄奘的治学道路以及唯识宗的学术趣旨,为全面评价玄奘的学术贡献提供新的思路;从与天台学说的比较研究中,揭示华严哲学思辨对《起信论》原理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华严学者过度诠释“即体即用”一元思维命题的实质,指出它在纯粹佛教哲学理论建设之外,蕴含着对当下世俗秩序肯定的内容;“禅宗”或“禅宗思想”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对禅宗的认识有必要从思想史的角度展开,因而有关禅宗何时成立、它的创始人是谁,其实都不是关键性问题,而如何辨明各类禅宗语录所体现的哲学原理、思维特征、思想原则,以及禅宗所代表的文化环境、思想基础,则理应成为禅宗研究的主要方向,为此,如何从思想史研究角度,以理性的学术态度和学术规范,重新整理和诠释禅宗文献,全面考察和认识各个时期禅宗思想的特点、传承和变化,指出禅宗主要人物及其思想的形

成基础、演变过程,分析其中隐藏的深层原因、表达的文化特质,成为思想史研究的重心所在;早期的禅宗、鼎盛时期的禅宗、衰微时期的禅宗,无论在外部形态上,还是思想表达方式、具体修习途径上,都有比较明显的差别变化,有必要将这些差别变化通过理论分析的方法予以清理,以便进一步探讨造成禅宗派系思想差别的深层原因;基于禅宗源流和传承等方面的差异,禅宗派系之间在语言表达和行为方式等领域存在若干分歧,这些分歧间接影响到宋明理学派系的思想表达和价值取向,这些也都在本卷中给予了必要的关注。

第三卷阐述宋元明清以及近代佛教思想的衰退事实及其原因。该卷着重研究和阐明衰退时期中国佛教思想的基本形态,分析产生这些形态的文化前提,指出这些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推及传统佛教思想向近代过渡和转化的必要性、艰巨性。该卷集中处理和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佛教思想如何影响程朱理学、阳明心学,而程朱理学、阳明心学又如何决定宋明佛教思想的演变趋势,虽然这些课题早已为学界所关注,但由于儒学研究与佛学研究之间长期处于隔阂状态,致使这种关注终难获得理想的结果,故需要从儒、释两家相似的思维习惯、理论形态、心性原理、宗教修养,以及非知识论倾向中寻找答案,从共同维护王权统治的意识形态方面予以解释;筛选五代末年至北宋前期佛教思想的代表性人物、标志性著述及其思想学说,对这些人物和思想予以分析研究,作出恰当的定位和评价,这关系到该历史时期社会思潮形成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宋元明清宗派佛教思想普遍消衰,但天台佛学仍有局部承绪的迹象,而部分禅师发出对丛林佛教的严肃批评声音,并在民族矛盾上升时期表达激越的民族情感,对这些现象需要作出理性的分析和评价;“四大高僧”和“四大名山”是明清佛教的重要课题,部分教界或学界人士通常从传统观念出发,放弃对客观事实的深入考察和追问,从而造成许多偏离事实的误解,为此也有必要从确凿的历史资料出发,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对这两个问题展开理论分析并作出个性化的评价;对于雍正的所谓“御

制佛学”，教界或学界中也存在不少明显的误读，需要通过具体材料的披阅和分析，以获得事实真相的认识，得出符合实际的客观评价；藏传佛教在元代和清代获得重大发展机遇，需要对它的教派思想分歧进行研究，尤其对宗喀巴中观应成派思想作出客观分析和评价；近代佛教思想的变化，主要落实到金陵刻经处（以杨文会为代表）、支那内学院（以欧阳渐、吕澂为代表）等学者团体身上，而具有淑世情怀的近代学界人士则从不同角度作复兴佛学的努力，这些也都在书稿中得到应有的反映。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及其著述，往往局限于儒家和道家思想方面，对于佛教学者及其思想，则多半采取勉强为之的方式；虽然一些《中国哲学史》著作涉及佛学内容，但是往往也只是作为形式之点缀，未及辨明佛学与儒、道两家思想的相互影响和内在联系。《史稿》则试图以佛教思想研究为核心，展开儒、释、道三家之学相互关系的具体阐释，考察和辨析三家之学的核心精神和本质特征，使通常所谓的“三教关系”获得史实和理论的证明，而非习惯性地停留于一般性叙述；在指出佛教思想学说、概念命题、思维方式对儒、道两家影响（具体内容、过程、特征）的同时，揭示儒、道两家思维习惯又如何改造了佛教的般若学中观思维方式，使之屈从于儒家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观念。佛教思想不是一种纯然独立于现实世界，与儒、道两家不相关联的学说体系；恰恰相反，佛教自进入汉文化区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接受儒、道两家文化思想的影响。

这也就意味着，对佛教思想史的研究，不能没有儒、道两家思想文化的知识背景，不能脱离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思想因素，不能就佛教思想本身作单向的描述，也不能单纯依据佛教所提供的资料，沿着信仰者设置的路径予以思考。科学研究的基础应是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确立，即在把握基本史料的前提下，对相关史料作出理性的、科学的严密分析和逻辑推论。

在长期的佛学研究过程中，我也逐渐意识到，如果没有儒、道两家思

想文化的知识背景,注定无法把握佛教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以及这个过程的社会条件、内在原因、最终结果,也难以对具体人物及其思想进行客观的评价。单纯的佛教典籍不能提供对佛教思想的准确解读,因为佛学概念、范畴的演变,佛教的历史命运始终与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正是儒、道的文化观念和话语地位决定着佛教的“中国化”、“民族化”。

佛学包含宗教哲学的思辨内容,它具有完整的概念、范畴系统,以及在命题建构中严密的逻辑推论方式,不仅唯识学是如此,即使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也有系列概念、范畴系统以及大量哲学命题,所以我们有必要以哲学的反思精神去认识它、解释它,在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大背景下研究佛学。比如,对于禅宗提倡的那种非概念、反逻辑的直觉体悟,需要我们运用近代科学的思维、理性的方式加以重新认识,不必随顺它的心性自觉的顿悟理路;在对表象予以击节赞叹的同时,自觉揭示表象背后的本质,方可实现真正的学术进步。

与此同时,在中国哲学史长期教学过程中,我同样意识到,佛教哲学和佛教思想作为中国古代哲学、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期待着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者重新审视佛学的地位,考察佛教的理论思维形态、哲学思辨方式,关注佛教思想的发展演变以及衰颓原因。佛教思想的研究理应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基础部分之一,若没有(或者缺乏)佛学的基础知识训练和总体精神把握,则难以深化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研究。六朝以后的中国古代哲学,无处不为佛学的精神所渗透,佛学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佛学的思考对象及其范围,佛学的多数概念、命题,已经成为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佛教思想在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中的地位已是不争的事实,佛教思想史在当今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中的意义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就目前阶段而言,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已经取得可喜的学术成果,但是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需要改善的地方也还很多,研究者知识结构和理论思维的改善显然是必要的。多

年以来,上述观念成为我不断激励和鞭策自己的动力。

在程朱理学形成之前,佛教的理论思维和价值观念对汉民族思维习惯的影响,以及对传统思想和学术形态(包括概念、范畴、命题)的演进,无疑是持久而深刻的。在程朱理学形成过程中,佛教学者所持的研究态度和思考方式为理学所吸收,成为理学家们哲学思辨的重要资源。在相似本体论论证方式的形成、即体即用思维习惯的确立、“复性”式心性论命题的建构等领域,佛教哲学的思辨精神均为理学家所熟悉。明代中叶起,随着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勃兴,禅宗式的智慧直觉和心性证悟借机获得复兴,哲学思辨对于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的意义受到质疑,人们的概念思维能力和形上学水平处于持续退化之中。

基于上述思考,《史稿》试图将佛教思想与传统思想的关系这个核心论题贯穿始终,并将它梳理、归纳为以下两条基本发展线索。

其一是针对外部世界的反知论系统。它由先秦天人关系中的非理性思维发端(以老庄学说为代表),形成以超越“智慧”名义的反知论的直觉思维习惯,在魏晋时期上升为玄学的本体论哲学思维,并通过与佛教般若学中观学派的遮诠式思维结合,形成部分上层知识人士的精神反思活动(这是因为,中道原理以完备的中观学派理论体系为基础,其中的概念分析和逻辑推论相当清晰,本质上是一种哲学观念表达形式,在它的遮诠式思维中已经包含着强烈的精神反思;只是在《起信论》理论体系形成后,它的基于“诸法性空”、“中道实相”而表述的“不二”学说被严重曲解,成为放弃理论思维和精神生活的遁词)。其间道教的外丹学说及其个体修炼成为上层人士的风尚,而在般若学中道思维的影响下,“道体论”作为道教的形而上思维对象也得以成立。在反知论成为哲学思维主流的基础上,真理性知识追求和逻辑化理论思维遭受严重挫折,知识传统因无法获得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持而失去传承的机会。

与此同时,本土佛学经典性论著《大乘起信论》应运而生,开创“一心二门”的相似本体论,它的“即体即用”学说为隋代及唐代前期的许多佛

教宗派(印顺所谓“真常唯心论”系统)接受并发扬。基于士族贵族的社会地位和精神需求,六朝佛教学派和隋唐早期佛教宗派创建了大量哲学概念和范畴,并通过系列哲学命题来论证各自的学说体系。一方面,它使形而上的哲学思维得以延续和发展,达到相当高的哲学抽象水平;另一方面,对宇宙人生“真实”的神秘体悟始终排斥着对外部世界事实真相即真理的探索。禅宗继承反知论直觉思维传统,在间接展开社会批判的同时,将深刻的哲学理论思维化为当下的思想片断。宋儒的“理一分殊”命题,既借鉴了道家的概念范畴,更在改造华严“一真法界”范畴的基础上,运用了华严宗理事关系的哲学思辨。理学家们虽然也谈论“格物致知”,但是最终要将知识对象落实到现实社会日用,并以宗法意义上的人情世故作为最高知识范畴去把握。如实而言,认知系统在古代传统思维世界难以获得确立,因为儒、释、道三家之学都缺乏这方面的兴趣。所以总体上看,在秦汉统一王朝形成以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吏治精神不断巩固,士人思考的重心往往落在如何消解问题意识,如何将复杂的哲学问题和理论思维化为内心世界的精神满足,通过心性自觉实现对外部世界的整体性把握。

反知论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也能引发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激情,但是就总体上说,超越性“智慧”折射的是农业文明下的经验性思维成果,它消解了对外部世界持之以恒的探索热情,也妨碍了对现实社会人生作出根源性理论批判。

其二是关于内心世界的心性论系统。基于先秦诸子(如儒、道、法、阴阳等家)对社会政治伦理的兴趣,在秦汉统一王朝形成之后,王权伦理观念日益受到重视和强化;又因历经战火离乱之苦、王朝更替之悲,士人的精神生活逐渐转向个体内心世界的探索,即转向个体心性本质的悬设及其体验,并以“内圣外王”作为社会人生的最高境界;放弃理论思维的学术探讨而专注于主观心性经验,成为般若学转向涅槃学的真实文化背景。六朝后期,涅槃学在梁武帝萧衍的支持下迅速壮大,随之而成为一

门显学。也是从六朝后期起,道教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从道体论研究转向道性论探讨,并付诸修道体验。其时,《起信论》的“本觉”思想引领心性直觉思潮,配合即将诞生的新的统一王权,进一步将思想界的关注导向个体心性觉悟,又结合儒家固有经典《易传》、《中庸》等,展开道德主体的自我实现活动。

中唐以后,禅宗通过对般若学“诸法性空”、“中道实相”原理所作的象征性继承,在回顾老庄反知论直觉思维的基础上,全面发扬《起信论》的“本觉”精神,使如来藏思想获得教界广泛的认同。此后,佛教的如来藏学说与传统儒家的性善论融会,使在六朝时期已经形成的“复性”思想进一步全面落实,心性的直觉体验成为儒、释、道三家学说的共同归趣。在这个过程中,儒家建立起程朱系统的“性即理”命题。在该命题中,程朱既吸收了华严的哲学思辨,更借鉴了天台的心性理论,并以禅宗的修养方式将精神生活予以程式化。如果说程朱基于重建社会伦常秩序的需要,极力抨击禅宗思想系统,故有建立形而上哲学思辨的意向,并试图作出知识论取向的二元思维努力,那么在王守仁那里就再度回到类似禅宗的直觉思维传统,所谓“思想解放”的核心仍然是道德主体的自觉。阳明学的某种思想史意义,是以放弃外部世界认识、严格封闭知识追求为代价的。在近代认识及其观念未能确立之前,所谓“生活世界”只是超越时代的虚幻境界。基本道德原则虽然具有普世的内涵和意义,但在古代王权统治的历史时期,具体的道德规范总是与统治者的利益诉求相联系的,形而上的伦理“本体化”玄思也必然落实为形而下的忠孝仁义道德践履。

概括地说,随着《起信论》“即体即用”思维模式的推广,心性直觉的道德境界论获得儒、释、道三家的一致认同,“复性”原理逐渐为三家学者所把握,也就既成为他们阐述哲学思想的起点,又成为他们落实道德原则的终点。所谓“复性”者,意为恢复本有的涅槃佛性,它与人皆具有如来藏(相当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人性本质论相联系,建立于“即体即用”

一元思维的理论基础上。也就是说,众生之所以能“复性”,是由于众生无不具有实体性“如来藏”佛性,如来藏既是现象世界的最终依据,并与现象世界存在着“相即”的关系,又是众生心性的最终根源,并内在于一切众生心性之中。性用、性情、善恶等概念或范畴,在形式上具有对待的意义,但就本质而言则是相即统一的,这就构成了“复性”的理论前提。所以,只要通过神秘的道德体验,或直观个体本觉心性,本质意义的“性”必然获得复归。在这里,一切概念思维、逻辑推论都是多余的、不可靠的;世界的最高真实、人生的全部意义,就在这当下的心性直觉之中。显然,“复性”说既具有某种社会批判的思想价值,而它逃避现实的本质倾向也不容忽视。

在某种意义上说,“复性”是中国哲学史的核心范畴(也可视之为核心命题),它表达了古代中国哲学的基本思维原则和道德实践原理。宋儒人性论命题“性即理”,既有儒家传统人性论的因素,更受佛学相似本体论哲学思辨的影响,还与天台的“性具”止观学说相联系,是“复性”原理的最终表达形态。它的形成及其发展变化,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概括性表述。

在《起信论》出现之前,儒家学者萧衍已经表达了与“复性”一致的思想,只是尚未系统化;他的“心统性用”说的提出,就是要解决所谓的“返性”问题,而所谓的“返性”,就是通过为善去恶回归人性本质。说的是儒家的人性论,但渗透着此后《起信论》“一心二门”的原理。以此为发端,思想界进入心性哲学思辨的繁荣阶段。不久,《起信论》引入大乘如来藏思想,从而不仅奠定了现象即本质的思维原则,而且也指出了以“本觉”为基础的复性原理;沿着直觉如来藏佛性的“本觉”思维,儒、释、道三家都作出积极响应,因为它为人们的思想方法和道德实践提供了简捷方便的路径。其间,梁陈之际的道教学者宋文明以“道性”为起点,提出“复其性命”之说,此说直接揭示了“复性”原理(认为天性之极为命,即性与命是相合的概念,复其性命也就是“得常道之性”)。这种“复性”思想的提